

台江文史資料



89

中國人民
政治協商會議 福州市台江區委員會

5

封面设计：董 瑜
责任编辑：林蔚民
黄秀梁

《台江文史》第五辑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台江区委员会
一九八九年十月

台江文史

目 录

第五辑

一九八九年十月

- 南台造船及与琉球交往史话……………王国维 (1)
- 福州南台“电光刘”家族史略……………李益清 (5)
- 福州的“台伏”与“台伏票”……………徐天聪 遗稿 (13)
- 解放前台江汛的“马路四怪”与商业广告……………林祥彩 (17)
- 福州救火会概述……………林希春 林增城 (19)
- 福州龙潭义葬社……………曾祥荣 (34)
- 台江道头与操纵道头使用权的封建把头……………曾祥荣 (39)
- 台江蜑民生活的苦难史
- 附台江渔歌一束……………林增城 (43)
- 私立福州文山女子小学简史……………邓碧玉 (49)
- 近代翻译家、文学家——林纾
- 附林纾二、三事……………林祥彩 (58)
- 卢诗如先生的一生……………郑慈贤 林希春 (64)
- 基督教台江区简介……………黄钟藩 (69)
- 福州天主教的来由及台江区天主堂……………翁福明 李翼文 (73)
- 台江区历次区域变动情况……………林增城 (80)
- 历代咏南台诗选 (上)……………林家钟 (83)

南台造船及与琉球交往史话

王 国 维

（一）造船与开港

《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》（章巽著）一书载：“春秋时，越国和吴国都设有“船宫”（造船工场）。同书有关福州造船的记载，是在三国时代。我近在《交通史谭》（福州市郊区交通局编史办公室编）“闽江船只始源”一节中看到：“论福州地区造船之祖首推先秦时生活在闽江口一带的蜑族。当时蜑族制造一种首尾皆尖的船，船身平阔，其形如蜑，故称蜑船，”又据《地名志》（福州市郊区建设局地名办公室编）载，“先秦时代我国东南沿海，除越族外，尚有另一种民族称为“蜑族”……后来改称水上居民”。“蜑族生活海上，善于造船、制盐，惯于捕鱼、采珠”。这是我见到有关福州造船的最早记载。

三国时期的三大造船中心是：永宁县（今温州）、番禺县（今广州）和建安（今福州）。吴国曾在福州设立温麻船屯，专门制造各种海船。吴天纪四年（280年）吴被晋灭时，吴船被缴五千余艘，足见当时福州造船规模之大和造船数量之多。（据《明末清初海上贸易》一书中“悠久的造船历史”一节）。

唐时在福州建造的“唐船”，长二十丈，结构坚固，比

同时的日本船和波斯船坚固，所以当时来中国的阿拉伯人都改乘“唐船”。

宋绍兴十年（1140年），张浚在福州大造海船三千艘。南宋淳熙十年（1175年）朝廷复命福州建造海舟。（以上二段据《明末清初海上贸易》一书。）

明嘉靖十三年（1543），陈侃出使琉球的海船因船体太大，在福州南台造好后，无法直接出海，“必潮平而后行”。据《中琉关系史论文集（福建师大编）徐恭生教授文中写到明代在南台造船的具体地点：“在南台江边。旧为林尚书业，占地十亩，官府以雪峰寺四十亩五分易之，为造船之所”。

清乾隆十三年（1788年）琉球国接贡船破损，清廷赐银一千两，另借银六千六百两，让他们在水部灰炉头（今炉边街）造船回国。见《中琉关系史》。

清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。闽浙总督左宗棠倡办福州船政局，首任船政大臣为福州人沈葆楨。福州船政局规模之大，设备之齐全，在远东地区罕有其匹。至1907年计造各式兵船、商船四十艘，总吨位为四万六千多吨。至此，以福州南台为中心的造船工业移向马尾。

福州从古就是对外往来的港口。

东汉建初八年（83年），东冶港（今福州）成为直达交迹（今越南）最古老航路之一。

唐末五代初，王审知治闽，开辟海港，发展对外贸易。

明弘治年间（1488—1505年）于福州南台开凿新港，接通闽江，使贡船和商船可在内港停泊，便于管理。新港开凿后，时开时塞。乾隆十二年（1747年），因福州亢旱八个月，南台和东门一带村民要求重新开港，于是巡抚潘思渠又

将新港开凿。

（二）与琉球国的往来

琉球国人魏士哲，于康熙二十七年（1688年）向黄会友学习补唇技术。黄会友当时住南台潭尾街，“有祖传补唇奇方，周旋四方，疗治缺唇。”起先黄会友不肯传授，后以士哲诚心求教，只好答应了。于是士哲与黄会友结盟，昼夜孜孜学之，已阅二旬，悉受其妙方。此时有缺唇童子二人请黄先生疗治，其中一人十四岁，先生治之，又一人十三岁，士哲在先生面前治之，皆不数日全愈无痕。魏士哲回琉球后不仅治好许多缺唇的小孩，而且给国王世孙尚益疗治缺唇，仅三昼夜全愈无痕，深得琉球国王赞赏。魏士哲以后又带了二个徒弟。从此补唇技术在琉球国推扩开了。

琉球国在福州学习的留学生，学习的面很广：有儒学、天文、地理、医学、音乐、绘画等。程顺则曾在福州朱子学家陈元辅门学习四年，著有《六谕衍义》在福州印刷，带回琉球，后传入日本。

朱元璋建立明朝政权以后，一面颁布“片板不准入海”的禁海令；一面派遣使者招谕四海，使诸国“称臣入贡”。为了保持琉球国的朝贡关系，在洪武二十五年（1392年），“赐给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，令其往来朝贡。”明茅瑞征言“洪武所赐三十六姓多闽之河口人。”

琉球使船定制二年一贡。琉球国为了增加贡次，多获利益，（明清两代为了政治上达到宗主国地位，不惜在经济上给朝贡国极大的优惠。）以各种名义到中国来，平均每年有二条贡船来华，除少量贡品外，携带大量商品，于每年十一月初五日起在福州河口“琉商会馆”（太保境附近）开馆贸

易，于次年四月廿九日完竣。五月初八日返回琉球。当时为琉球商人作翻译和经纪人的，多是河口人，形成十家帮。据傅衣凌《福州琉球通商史迹调查记》载：“迄于清代，河口仍为琉球商人集居之地，故老相传，当贡船来时，其地繁华殷盛，曾为全城之冠。”

琉球国输入的商品为海带、海参、鱼翅、目鱼干、刀石、铜器、白纸扇（日本折扇）、木耳、夏布等。输往琉球的商品是：毡条、药材、茶叶、瓷器、白糖、沉香、漆器、绸缎、油伞等。

科举·举人·状元

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的产物，始自隋文帝开皇七年（公元五八七年），终至清光绪三十一年（公元一九〇五年），是统治者选官拔吏的主要手段。

明清时代，凡入学者必经童试，录取者称为童生。再经“岁考”和“科考”，及格者称“附学生员”，俗称秀才。明清的科举主要分三级，即乡试、会试和殿试。

乡试又称“科考”，在各省城举行，三年一考，录取者称“举人”，也叫“孝廉”。第一名称“解元”。

会试是在乡试后次年春天举行，参加者为各省举人，在京行试。录取者称“贡士”，第一名称“会元”。

殿试又叫“廷试”，这是贡士经过复试后，在京都太和殿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一种考试。第一名称“状元”，二名称“榜眼”，三名称“探花”。举人经会试、殿试及格者，均称“进士”。

福州南台“电光刘” 家族史略

李 益 清

福州南台电气公司创办人刘家，是闽中望族，世代为官，民国后弃官就商，也是福州刘、黄、罗、尤四大家族之首。（刘是：刘家望族福州南台电灯电话公司刘崇伟。黄是：百万富商黄恒盛家族，开设恒盛布庄在上杭路，黄占鳌、黄占鸿同胞兄弟。罗是：福州巨商包括金融、木材、茶业、百货、锯木业等，开设下杭路、海防前、南禅寺三处，罗勉侯。尤是：福州望族开设百龄商行于大桥头，尤德钐、尤德锜、尤德龙三兄弟）。

为什么人们称“电光刘”呢？因为福州致力兴办民族近代工业，发展比较大的企业，就是福州南台电气公司（即南台电灯厂）和福建电话公司，都是由刘崇伟创建起来的，在福州妇孺皆知，人人羡慕，所以“电光刘”在榕城闻名很久，首屈一指。

发家致富，一枝独秀

刘家筹办民族近代工业，始于刘学恂后代。学恂有子八人，崇佑、崇伟、崇杰、崇善、崇伦、崇侃、崇良、崇桢。

崇善崇良早亡，崇佐在抗日战争初期，驾驶中国航空公司桂林号飞机，被敌机扫射殉职，所以与刘家发家有关者，仅长子崇佑，又名嵩生，次子崇伟，又名健庵，三子崇杰，又名子楷，五子崇伦，又名雅扶，六子崇侃，又名景韩，仅五人。学恂这五个儿子，在刘家兴办近代企业中各有作用，崇佑和崇杰给刘家发展近代工业，以政治上不少的支持，崇伟因一向在福州官场周旋，又当过福建银行经理，对福州官场人物和金融界商人很熟悉，所以主要担任对外交际折冲和为企业筹款工作，他是福州南台电灯厂与福建电话公司总经理和董事长。崇伦是兄弟五人中唯一学电气技术的，同时也从日本学到经营管企业的技能，因此主要担任刘家企业的技术和筹划工作。崇侃学商科负责企业会计及总务管理工作。实际主持企业的是崇伟与崇伦。刘家发展近代工业的一切筹划，皆出崇伦之手，在刘家资本集团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。但这五兄弟中成为刘家企业继承人者，却只刘崇伟这一支。崇伟有三子，长永业、次洪业、三涛业。长子刘永业，1933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商学院，在刘家企业之一公大商行任会计主任和建记行经理，抗战后回福州，一直为刘家企业工作。次子刘洪业，1934年毕业于日本福冈明治工业专门学校电气科，是刘崇伟兄弟下一辈中，唯一学习电气技术的，回国后入刘家电灯厂当技师。崇伦失踪，他成为刘家企业主要负责人和筹划者。三子刘涛业，1936年毕业于奥国维也纳外交学院，解放前不久才回到福州，在刘家铁工厂工作。三兄弟中主要人物是永业与洪业，而洪业实际上代替了崇伟在刘家企业中的地位。

创办企业，全盛时期

刘家早期在福州开设德成、即成、复成三家当铺，又开设天泉钱庄（发行信用流通券）。在1891年以前，并开设长兴和闽清县慎成，长乐县信成三家当铺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，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企业发展很快，于是刘学恂也向往于兴办近代工业，起先办了一个糖厂，虽告失败，但给后代经营近代工业开了一个头。刘学恂有八子，其中五个均留学日本，回国后倡议创办电气公司，刘崇伦于清光绪年间，在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是学电气技术的，在刘家企业集团中最有眼光，故对发展资本主义企业起了重要作用。从1910年至1927年间，共创办了以福州南台电气公司为中心的福电铁工厂，福建电话公司等大小工商运输业10多个。其中有刘家兄弟合资经营的企业，也有与社会合资的股份有限公司。这些企业的总负责人，在1927年以前主要是刘崇伟，1927年以后则是刘崇伦。1937年冬，刘崇伦被特务杀害后，则由刘崇侃负责，抗战胜利后则由刘崇伟的次子，在日本福冈明治大学专门学校电气科毕业的刘洪业负责。

综观刘家所办的企业，从1910年起至1927年是全盛时期，这一时期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经济都有刘家发展企业的有利条件，如（1）其祖先都是高官显宦，原系福州巨族，因此自有余泽福荫，便于取得政治地位，容易与官方打交道。（2）刘崇伟于民国后任福建银号（即福建银行）经理，在福州金融界很有地位，对发展企业筹集资金比较方便。（3）用人唯才，刘家兄弟都是学技术和经济的，故十分重视技术人才，在企业中的高级技术人员都是国内专家，绝大部分还留学国外如孙世华、林天明、刘爱其等，（4）因刘家二代

都留学日本，故常能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有关设备燃料等方面的支持。

兹将福州电气公司及附属各企业创办及发展简况分述如下：福州电气公司（福州南台电灯厂）于1910年（清宣统二年）由刘崇伟、刘崇伦等人出资八千元，承接林友庆的耀华电灯厂，改名为福州电气公司，开设时集股十二万元，刘家出资占三分之一，厂址在南台新港，1912年发电能力，只有300瓩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该公司于1914年第一次增资至三十万元，向日本购进美国造的500瓩发电机一部，除供市民照明及工业用电外，在夏季还备有电风扇约500架出租，每架月收租四元，由于原发电机不能满足社会需要，故增购1000瓩发电机一部，到1918年公司第二次增资至七十万元，又购进1000瓩发电机一部。1927年该公司第三次增资至一百三十万元，向捷克购买3000瓩发电机一部，装在鸭姆洲新厂，该公司为了保证发电机的零配件需要，故设立福电铁工厂，它原是一个修理工场，只有四尺车床及小钻床各一台，只能修理极小的机件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外货来源困难，公司只能设法自制，于是陆续添置各种工作母机及许多精密仪器，仿制各种大小机件，使发电机能正常运转，安全供电。福州电气公司在三十年代初，已有发电设备五千五百余瓩，供电范围扩展至郊区并致力于农村电气化工作，向长乐连柄港输送电力进行农田灌溉，并设立农村电化部，在洪山桥科贡农村设电气化农场。不但开辟了电气发展之途，亦可提高农业产量，减轻劳力，增加收入，一举数利。福州电气公司这种利用电气发展努力于农村电气化的做法，当时在全国尚不多见。

还于1912年（民国元年）接办早在清光绪三十年（公元

1904年)设立的官办电话,定名为福建电话股份有限公司,刘崇伦任董事长兼经理,开始时股本四万五千元,在城内塔巷、南台中平路及仓前山麦园路三处设交换所,装磁石式电话,交换机300门,实装用户200余户,全年电话月租费收入一万八千六百多元。至1927年(民国十六年)公司资本增至十四万二千元,至1929年(民国十八年)交换机已有800余门,用户600多户,全年电话月租费收入五万八千六百多元,由于机线设备陈旧,通讯效率不高,故改装美国制造的史端乔式自动电话交换机1500门,分装南台中平路1000门,城内塔巷500门,于1930年1月1日投产,实装用户700多户,全年电话月租费收入九十多万元。1920年(民国九年)公司为了解决发电机需用的燃料煤炭,故在建瓯创办梨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,所产的无烟白煤,除供公司搭配使用外,还行销建瓯、南平、莆田、福清、平潭等地,到1921年产量已达10723吨,但好景不长,中途停工。公司又为了推销电力,故于1916年设立玻璃厂,专制电灯罩和电灯泡。1917年设立精米厂、炼糖厂。1919年设立冰厂,置有日产七吨冰片的机器两台,制造鱼冰和食冰,垄断福州冷冻市场。同年为了经营农肥有利可图,故设立油厂制造豆油、花生油和农业肥料豆饼、花生饼等。1920年开设大用、同光电料行,同年还分设福清电灯公司及连江电灯公司。1926年创办建兴锯木厂,用木屑为发电燃料,降低电力成本。1927年为了运输台湾煤炭需要,设立刘正记轮船行,购千吨货轮“建新号”一艘,以后又增购二艘,除运煤外还兼运客货,甚能获利。公司除开办以上企业外,还于1912年派员勘察古田溪和仙游九鲤湖水力,计划建立水力发电站。赴建瓯东游勘察金矿,赴永泰勘察铜矿,赴安溪勘察铁矿,计划开发地下资源建设福建,

虽这些计划在旧社会不可能顺利实现，有的工厂创办不久即告停业，有的措施困难重重，无法实现，但刘家对发展工矿企业的远大眼光及雄心壮志，是当时福州其他工商业大家族所望尘莫及的。

萎缩因素，趋向殒落

1927年以后，国民党势力逐渐加强对福建的统治，官僚资本势力压迫，加上时局动荡不安和战乱频仍，以及地方封建势力猖獗，都打击和摧残福建民族资本的发展，这时刘家以电气公司为主体的许多工商企业尤为突出，这时刘氏家族的政治地位，已发生变化无能为力了，窃电欠费和拒不付费问题日益严重，军警特务流氓台湾浪人以及封建官僚士绅窃电欠费特多，收入锐减，公司遭受严重打击，这给福州电气公司造成很大的损失。刘家电气公司，历年向银行钱庄以及其他方面的短期重息借款数字甚巨，仅1929年即高达十五万元，这也是加速刘家企业萎缩的直接原因之一。再则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期，时间延续了七年，刘家企业受不景气的影响，周转更加不灵，同时福建人民掀起了大规模抵制日货运动，对与日本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刘家民族资本企业，又遭到打击，这样，自1927年以后，公司的股息和纯利绝对下降了。刘家其他企业也都遭受上述原因的影响，但程度上有所不同，福建电话公司由于资本不足，资金周转困难，营业不振，1926年起股息和纯益相应下降。建兴锯木厂于1927年停办。福州油厂因营业不振，在1927年电气公司困难重重时，决定停止兼营各业中，宣告停办。福清和连琯电灯公司，由于地方封建势力的膨胀，阻力重重损失不貲，于1929年相继停业。福电铁工厂、冰厂、刘正记

这三家企业，在这一时期处境差强人意，有的获得微弱的发展，有的获得了较大的发展，但这不能挽回刘家资本企业的萎缩趋势。

从1937年至1941年是刘家企业从萎缩趋向没落的时期。没落过程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：第一阶段是抗战期间，是刘家企业开始衰落的阶段。第二阶段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至福州解放前夕，是刘家企业被官僚资本合并和苟延残喘的阶段。1938年南京陷落，福州开始紧张，1939年敌机滥炸福州，人口及物资多向内地疏散，福州市景十分萧条。1941年和1944年福州经两度沦陷，在日寇抢夺破坏下，经济复备受摧残，加上抗战期中，国民党政府通货恶性膨胀，物价飞涨，民不聊生，民族工商业和农村经济遭到致命的打击，刘家企业自不能避免。1939年公司连遭敌机八次轰炸，又于1940年遭受十年未有的大风灾的袭击，可谓祸不单行。凡此种种天灾人祸的打击，都使公司不断受到巨大损失。然而给公司以致命打击的，却是国民党的通货膨胀和千捐百税。总之刘家电气公司，自1937年七月以后历年亏损。长乐莲柄港抽水设备全部被抢，输电线路全部被炸，公司财产损失极大。到1945年9月，抗日战争胜利时，公司仓库材料一空，企业满目疮痍。

福建电话公司，自抗战发生后，机关学校及商民内迁，继又受敌机轰炸，公司财产和营业均损失惨重。1941年公司亏损从此便一蹶不振了。福电铁工厂于1939年迁往南平，因东南各省战争节节失利，铁工厂产品销路逐渐缩小，业务萎缩。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春迁回福州，一艘载有贵重机器的货轮失事沉没，损失惨重，从此铁工厂便趋于衰落。刘家的冰厂因抗战海口封锁，渔业萧条，营业冷淡，仅制小块冰市

及冰淇淋，改称瀛洲冰淇淋制造所。

刘家最主要的企业——福州电气公司终被官僚资本所吞并，所办其他企业也是“日落西山”“朝不保夕”，刘家的电话公司到解放前夕，已处于瘫痪状态，其他如铁工厂、冰厂等企业也都一息奄奄。

从刘家兴办近代企业总的趋势来看，也正是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压迫下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没落过程中的必然趋势。

“连中三元”解

连中“三元”是什么意思呢？

“三元”，即解元、会元、状元的统称，三者分别指明清时代开科取士的乡试、会试、殿试的第一名，明代也以殿试的前三名为“三元”，即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。

明清时代，考试分为四级，即院试（县、府试）、乡试（省试）、会试（京试）和殿试（廷试）、院试在县、府举行，童生可以参加院试，考取的称为“生员”、“相公”，或称“秀才”。

乡试一般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。考试时间定在秋季，所以乡试又称“秋闱”，也有叫作“大比”的。生员（秀才）才有资格参加乡试，考中的称为“举人”。举人的第一名称为“解元”。

福州的“台伏”与“台伏票”

徐天胎

遗稿

旧福州地方银行和钱庄发行的钞票，最初为“钱票”及“银票”，嗣后为“台伏票”，最后为“大洋票”。本文仅就“台伏票”的由来、发行、式样以及作用等方面介绍如下。

（一）台伏的意义及其由来

“台伏”的“台”指福州南台，“伏”是“番伏”一词之简，“番伏”一词则从“番佛”转化而来。“番佛”是指外国输入中国的银元，为何把外国输入的银元称为“番佛”？是有其原因的，原来在明隆庆万历年间（1567——1619）从西班牙输入中国的银元正面，所铸的头像颇似印度佛祖，由此有“佛头银元”之称，因是外国输入的，故稿“番佛”，以后辗转书写为“番伏”，“番伏”在福州地区成为外国银元的通称。原来“番伏”（输入的银币）重量为库平七钱二分，（库平为清政府衡量标准），在流通过程中，各钱庄为便于鉴定和表示负责起见，在“番伏”上加盖铁制的截记，周转次数一多，所留下的记号亦多，以致使“番伏”百孔千伤。重量亦减（直至1927年后改为紫色墨水胶板印盖，才改变这种情况）于是“番伏”在流通中，产生

了“双手来捧以估重量”的方法，此即“捧番”或“捧银”或“台捧”名称的由来。民国以后改用新议的平码，以别于清代的库平。但新议的平码各地标准不同，福州城内和南台的标准也不同，南台平比城内平略大，南台平一两等于城内1.00292两，所以台伏票是南台新议平码为标准，民初福州城内钱庄所发行台伏票上盖有“约支台新议七钱台捧番”的字样，可资佐证。（台捧番非指南台有台铸银元的实体，只是指台伏票的面值等于七钱重的捧番而已）。

（二）台伏票的发行经过

1916年到1922年间，军阀李厚基主闽期中，设“福建银行”，以刘友敏为行长，发行小洋票、大洋票及台伏票，此为台伏票的开始。1927年间中美两国商人合资的美丰银行亦发行台伏票，除福建银行和美丰银行外，私人钱庄亦竞相发行台伏票。

台伏票仅行使福州地区，为地方性的钞票，按《中国货币发行史》中记载，台伏票为全国六大地方性钞票种类之一。

福建银行发行的台伏票，面值有一元、二元、三元、五元、十元、二十元、五十元、一百元、一千元共九种。美丰银行发行的台伏票，不另行印票，仅就该行发行的一元钞票下端两旁加盖“台伏”二字。

银行和钱庄发行的台伏票，数量不详，但福建银行倒闭，散在市面无处兑现的台伏票约有一百三十余万元之多。再从军阀李厚基曾向林熊祥（台湾林，台湾大地主）借款作为战费用的，其中台伏票占429000元；又向日商借台伏票360000元，从这些情况看，足见发行数量之多。